

· 新职业青年的就业与发展 ·

【主持人语】这是一组关于新职业青年的基于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的研究文章，而且主要聚焦于新职业青年中的一个类别，即“网约配送员”。“网约配送员”是国家正式的职业称号，坊间更习惯于用“外卖骑手”“骑手”“快递小哥”来称呼这个职业。他们的总人数目前还没有严格的统计数据，但根据相关调查估计，目前全国“外卖骑手”有1000多万人。他们在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保障社区居民供给的突出作用，给社会留下深刻印象。“外卖骑手”是一个小窗口，透过这个小窗口，我们看到两个就业的新趋势：一个是就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即与互联网相连的各种新业态、灵活就业形式、新零工经济等迅猛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下行压力下的就业问题；另一个是青年人的择业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即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工作的时间和节奏自主性强、灵活性强的职业。这种新趋势也带来就业的稳定性、灵活就业的劳动保障、制造业的“招工难”等一系列新问题，亟须加强对这种新趋势影响的研究。

这组文章还提出了“95后”的“新世代农民工”（“外卖骑手”中约60%是农民工）的新概念，认为他们与“70后”“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在职业选择、就业形式、市民化期望等方面呈现全新的特点。

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在推动就业新趋势研究方面给人启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 李培林）

新老世代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进程特点*

——基于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

高海燕 朱迪

【摘要】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一直为学界和国家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6—2021年）共15年的数

* 本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十四五’时期民生建设与构建新发展格局”（21AZD004）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提出的中肯的修改意见。感谢来自崔岩、龚顺等师友的讨论和意见。文责自负。

据，对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获得、社会保障、社会参与、本地人认同四个方面的变迁进行分析。本文使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方法，结果发现，随着国家不断出台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各项措施，农民工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社会参与、本地人认同水平方面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在就业稳定预期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没有显著改善。在分离了生命周期效应的世代效应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要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其就业稳定性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并未相应提升。“80后”新生代农民工尤其重视各类社会保障，相比较而言，新世代农民工的“高收入、高本地人认同”与“低稳定就业、低保障水平”之间的矛盾性值得关注。

【关键词】 市民化 社会融入 新世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

【作者简介】 高海燕，社会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讲师；朱迪，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2) 11 - 0046 - 25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水平得以大幅提升。197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只有17.92%，而2020年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比63.89%。^①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乡土中国”面貌，目前超过六成的人口居住在城镇，有近5亿的人口（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于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其中就包括近3亿的流动农民工，^②因此，有学者称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迁徙中国/流动中国”时代。^③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④城镇化以人为核心，就要直面流动人口问题，着力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以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76.html，2022年2月18日。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4/t20210430_1816933.html，2022年2月18日。

③ 参进程梦瑶、段成荣：《迁徙中国形态得到进一步确认》，《人口研究》2021年第3期，第75~81页。

④ 参见李锦斌：《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求是》2017年第10期，第41~43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2022年2月18日。

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和城市化的目标能否实现。

以往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研究呈现两个特点。第一，虽然建立的测量指标体系各有不同，但基本将市民化分为经济获得、社会保障、社会融入、身份认同等几个维度；^① 第二，用农民工群体与城镇户籍工作者的比值来衡量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这种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工与城镇市民之间的差距，在群体之间实现横向对照，却无法展现时间维度上市民化进程的变化。近十几年，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从最初的强力控制和限制，逐渐转变为以引导疏导为主，^② 出台市民化的管理与服务措施，再到大部分城市取消户籍限制，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国家政策的变化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需要通过纵向的分析才能体现。

此外，新老世代农民工因成长环境、平均教育水平的不同，而在外出务工动机、职业选择、生活、消费、社会交往方式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由新生代农民工引发的“代际革命”已被学者所注意。^③ 随着时间的推移，“70后”“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也进入人生的中年阶段，他们承担着组建家庭、养育孩子、照顾老人等生活重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最新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化趋势的主导性观点忽视了家庭化的深刻影响，家庭化提出的家庭延续与发展要求让他们转变了劳动伦理和消费观念。^④ 这对市民化研究的启发是，在剖析新老世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的差异时，需要将生命周期带来的影响也纳入考虑范围，只有通过分解年龄带来的生命周期效应，才能看到真正的世代差异。此外，随着“95后”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作为成长于互联网、平台经济的世代，他们的职业选择、就业形式、市民化期望也呈现全新的特点，本文将“95后”的农民工称为“新世代农民

① 参见李荣彬、袁城、王国宏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106个城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青年研究》2013年第1期，第1~11页；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61~79页；徐延辉、龚紫钰：《社会质量与农民工的市民化》，《经济学家》2019年第7期，第90~100页。

② 参见王春光：《中国社会政策调整与农民工城市融入》，《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5期，第8~14页。

③ 参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中国共产党干部论坛》2013年第11期，第19~24页；李春玲：《静悄悄的革命是否临近？——从80后和90后的价值观转变看年轻一代的先行性》，《河北学刊》2015年第3期，第100~104页。

④ 参见王欧：《家庭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型》，《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68~89页。

工”，将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本文使用了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模型，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放在年龄、时期、世代三个层面进行剖析，其中年龄效应代表随着年龄增长、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带来的变化，时期效应代表国家政策、市场形势、重要事件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世代效应则是指出生在不同年代的农民工，其成长关键期受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形成不同的能力、期望和社会价值观，从而导致不同的市民化进程。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市民化的概念操作

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研究中，社会融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视角。社会融合视角主要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的嵌入（embedding）观点出发，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仅包含经济领域内农民工的参与，还涉及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制度系统的融合和整合。^①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社会，但他们主要还是在不太成熟的市场层面与城市发生联系，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疏远乃至不认同的感受，处在“半城市化”状态。^②“半城市化”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农村流动人口只能从事非正规就业，并且没有被赋予组织权、社会保障权、发展权（比如受培训、受教育）等。在城市的社会生活行动层面，他们不能进入城市主流社会，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城市居民形成了明显的隔离，难以建立交往纽带。^③在社会心理层面，由于不被城市居民接纳和认可，他们对城市社会持有复杂的情结，逐渐地转向对内群体的认同，寻找内群体的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左右他们交往的原则是血缘、地缘、业缘和社会身份。^④

社会融合视角强调市民化过程包含经济、社会、心理、文化多个层面的融入，它不仅包括户籍本身的转变，还包括户籍之下的社会保障，以及生活其间的人能够在心理和文化层面都融入整个系统。因此，本研

① 参见黎红：《从嵌入、漂移到融合：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95~102页；黄斌欢：《双重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形成》，《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170~188页。

② 参见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107~122页。

③ 参见徐清华、张广胜：《居住隔离与农民工市民化》，《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43~53页。

④ 参见汪华：《乡土嵌入、工作嵌入与农民工集体行动意愿》，《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94~203页。

究将其作为市民化概念的分析框架,其中经济方面包含收入水平、失业预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方面包含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保险,社会参与包含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的建立,心理心态方面则指本地人认同。该市民化框架也许不能反映所有与市民化相关的概念和维度,但本文力图将社会融合的重要维度包含进来。下面分别从年龄、时期、世代三个方面论述农民工市民化的变化趋势。

(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

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年龄效应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过程明显受到年龄效应、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影响。^①李培林等对农民工的调研发现,收入与年龄呈现“倒U型”曲线,连续外出务工3年以上的农民工收入最高。^②在社会保障参与方面,年纪越大的人,其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障的需求越强,^③表现出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强的趋势;而在工伤、生育、失业保险方面,中年人处于生育以及承担最大生活压力的阶段,此类保障的参与意愿是最高的。在社会参与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在结婚生育前农民工参与各类老乡会、娱乐消费活动较为频繁,这些社会参与随着农民工步入稳定的家庭生活而逐渐变少,^④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状况成为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因素,老年人成为高社会参与群体的概率逐渐减小。^⑤因此,可以预期未成家的年轻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水平最高,其次分别是中年农民工和老年农民工。在本地人认同方面,已往研究表明在居住地居住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认同本地身份。^⑥由于在本研究中大多涉及的是县域以内的流动人口,年龄越大的人,在本地居住的时间越久,本地人认同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① 参见孙文中:《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的创业型社会融入》,《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11~120页;王欧:《家庭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型》,《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68~89页。

② 参见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42~52页;韩靓、原新:《我国农民工收入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人口学刊》2009年第1期,第37~43页;刘养卉、龚大鑫:《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兰州市的调查》,《西北人口》2015年第3期,第113~117页。

③ 参见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人口研究》2008年第5期,第48~57页。

④ 参见王欧:《家庭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型》,《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68~89页。

⑤ 参见谢立黎、汪斌:《积极老龄化视野下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及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19年第3期,第17~30页。

⑥ 参见崔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141~160页。

假设1：农民工的年龄和生命阶段对其市民化程度产生显著影响，表现为收入水平、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需求随着年龄增长呈“倒U型”曲线，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需求以及本地人认同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强，社会参与水平随年龄增长而降低。

2.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时期效应

按照社会发展时期的变化和重大政策文件出台的时间，黎红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①其中，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第一阶段（1984—2000年），农民在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的双重作用下，为改变贫困的生活境遇，冲破各种阻力进城就业，这一阶段的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强制性“嵌入”的特征，表现为劳动就业方面的被限制和被排斥，以及市民群体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第二阶段（2001—2012年），伴随中央提出要“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以及《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发布，农民工的城市工作生活环境有所改善，歧视性劳动就业规定基本被取消，社会群体关系趋向友好，但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农民工为了家庭生计，需要经常流动，变换职业和住所。城市提供的居住环境、社会福利、网络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城市中定居，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并不高，^②这一阶段具备“半城市化”的特征。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第三阶段（2013年至今），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问题得到党和政府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③这是首次从国家政策层面提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规定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人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人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④国家在城镇化政策上有了实质性的变革，为农村流动人口在50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市民化扫除了制度性

① 参见黎红：《从嵌入、漂移到融合：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95~102页。

② 参见俞林伟、朱宇：《社会融合视角下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及其代际差异——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74~84页。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④ 参见《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9-09/29/5435018/files/56eef378a89749a68d386cd3ba8b7159.pdf>，2022年3月2日。

障碍。

此外,近十年来,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明显放缓,很多地方出现“民工荒”的情况。^①在社会劳动力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价格势必会上涨,这对提高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社会政策根本性转变的“外部赋权”和劳动力转移拐点出现带来的“内部增能”背景下,本文提出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时期效应的假设:

假设2:随着时期的推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也随之提高。

3.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世代效应

在关于市民化的研究中,新老世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能力受到广泛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并在城镇务工的青年农民工,他们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迫切想融入城镇,希望获得城市居民的地位和身份的需求和能力都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②而随着“95后”的农民工逐渐走入劳动力市场,作为第二代农民工的子女,其价值观念、文化水平、就业选择等方面直接受到第二代农民工的影响,^③同时,他们作为在互联网迅速发展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其生活形态、价值观念又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因此,本研究将“95后”的农民工定义为新世代农民工,对其市民化特点予以重点关注。新世代农民工纷纷在“短平快”“高报酬”的激励下从事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他们具有更多元的职业选择和获取更高收入报酬的机会。与此同时,他们的农村生活经验尤其是务农经验有限,缺乏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吃苦耐劳的品质,家乡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回不去的地方”。^④新世代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也高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世代效应假设:

假设3:随着世代推移,新世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要高于新生代农民工,且两者的市民化程度都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① 参见魏万青:《居住模式与“用工荒”:兼论城市住房政策的调整》,《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203~225页。

② 参见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2012年第5期,第1~24页;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青年探索》2010年第3期,第5~15页。

③ 参见谢娅婷、张勃:《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城镇落户意愿研究——基于代际差异的视角》,《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第106~112页。

④ 参见谢娅婷、张勃:《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城镇落户意愿研究——基于代际差异的视角》,《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第106~112页。

⑤ 参见杜巍、杨婷、靳小怡:《中国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公共服务需求层次的代次差异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77~87页。

三、研究方法、数据和变量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是年龄—时期—世代分析模型。通常来讲，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情况下，年龄、时期和世代分析代表着不同的信息。年龄效应代表个体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生理、心理特点的变化。时期效应代表在调查时间当下宏观社会、经济、制度、政策等方面的变化以及重大事件带来的影响。世代与前两者不同，指的是同一个出生世代或者经历过同一历史事件的群体。年龄—时期—世代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Hierarchical-Age-Period-Cohort Analysis-Cross Classified Random Effect Model，简称 HAPC）^① 是一种在年龄—时期—世代分析模型中被广泛应用的方法，该方法假设年龄、时期和世代三个元素中年龄为固定效应，时期和世代为随机效应。这种设定打破了年龄、时期和世代三者的简单线性关系，使这三个元素不再处于同一个层面，而是产生了嵌套关系，从而使年龄、时期和世代相互间的线性约束不再成为问题。

(二) 数据和变量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 CSS）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2021年的调查。本研究借鉴国家统计局的界定方式，^② 农业转移人口即指具有农业户籍且从事非农工作半年及以上的人群。本研究的样本量共计 15548 份，其中历年的农民工样本量分别为 629 份、3414 份、1021 份、2028 份、1990 份、1978 份、2197 份、2291 份。在世代划分方面，按照 10 年为一代，将样本划分为“40 后”“50 后”“60 后”“70 后”“80 后”“90 后”“95 后”，其中，“95 后”的农民工被定义为新世代农民工，是本文的分析重点，因此将其单独划分出来。

市民化分析框架分为经济获得、社会保障、社会参与、心理心态。四个维度的具体指标和相应的题目如表 1 所示。

^① 参见 Yang Yang and Kenneth C. Land, A Mixed Models Approach to the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Data on Trends in Verbal Test Score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Vol. 36 (1), 2002, pp. 75 - 97.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4/t20210430_1816933.html，2022 年 3 月 2 日。

表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测量维度和题目

维度	指标	题目
经济获得	收入水平	您的个人月收入是多少元?
	失业预期	您认为自己在未来6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有多大?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您认为目前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	您目前有没有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您目前有没有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	您目前有没有生育保险?
	工伤保险	您目前有没有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您目前有没有失业保险?
社会参与	宗亲会/同乡会	近2年来,您是否参加了宗亲会/同乡会的线下活动?
	校友会	近2年来,您是否参加了校友会的线下活动?
	兴趣组织	近2年来,您是否参加了文体娱乐等兴趣组织的线下活动?
	职业团体	近2年来,您是否参加了职业团体(如商会、农村合作组织、专业学会等)的线下活动?
心理心态	本地人认同	就您目前的生活状况来说,您认为自己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各因变量、自变量、控制变量的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说明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收入水平	被调查者当年的月收入	3514.66	8124.61	0	330000
失业预期	1 = 完全不可能, 5 = 完全有可能	2.40	1.37	1	5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1 = 下, 5 = 上	2.30	0.91	1	5
养老保险	1 = 参与, 0 = 未参与	0.37	0.48	0	1
医疗保险	1 = 参与, 0 = 未参与	0.79	0.40	0	1
失业保险	1 = 参与, 0 = 未参与	0.10	0.31	0	1
工伤保险	1 = 参与, 0 = 未参与	0.15	0.36	0	1

续表

	变量说明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育保险	1 = 参与, 0 = 未参与	0.09	0.28	0	1
宗亲/同乡会	1 = 参与, 0 = 未参与	0.09	0.29	0	1
校友会	1 = 参与, 0 = 未参与	0.24	0.42	0	1
兴趣组织	1 = 参与, 0 = 未参与	0.12	0.33	0	1
职业团体	1 = 参与, 0 = 未参与	0.14	0.34	0	1
本地人认同	1 = 是本地人, 0 = 不是本地人	1.18	0.38	0	1
自变量					
年龄	被调查者当年的年龄	41.59	12.13	18	69
时期	调查时期			2006	2021
世代	10年为一组世代			1940	1995
控制变量					
性别	1 = 男性, 0 = 女性	0.54	0.50	0	1
婚姻状况	1 = 已婚, 0 = 未婚	0.83	0.37	0	1
流动状况	1 = 省内, 0 = 省外	1.20	0.40	0	1
受教育年限	被调查者受教育的年限	8.71	3.73	0	20

四、结果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包含经济获得、社会保障、社会参与、心理心态四个维度, 以下分别论述这四个维度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方面的变化趋势。

(一) 经济获得方面

经济获得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如表3和图1所示。

表3 经济获得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

	收入水平		失业预期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截距	6.758***	0.180	2.875***	0.087	0.738***	0.028
年龄	-0.0026	0.0015	-0.0062**	0.0016	0.0002	0.0003

续表

	收入水平		失业预期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年龄的平方	-0.0005***	0.0001	0.0000	0.0001	0.0001***	0.0000
性别	0.442***	0.015	0.028	0.028	-0.035***	0.006
婚姻状况	0.131***	0.023	0.020	0.041	0.071***	0.010
流动状况	0.178***	0.011	-0.055**	0.021	-0.068***	0.005
受教育年限	0.042***	0.002	-0.047***	0.004	0.015***	0.001
时期_2006	-0.890***	0.149			0.061*	0.027
时期_2008	-0.105	0.149			0.032	0.024
时期_2011	-0.173	0.148			0.093**	0.025
时期_2013	0.024	0.147	-0.140*	0.058	0.008	0.024
时期_2015	0.214	0.147	-0.060	0.058	-0.047	0.024
时期_2017	0.198	0.147	0.031	0.058	-0.108***	0.024
时期_2019	0.339*	0.147	0.007	0.058	-0.024	0.024
时期_2021	0.394**	0.147	0.162**	0.058	-0.015	0.024
世代_1940	-0.422	0.117	-0.003	0.040	-0.002	0.006
世代_1950	-0.246	0.105	-0.033	0.036	0.002	0.006
世代_1960	-0.054	0.101	0.001	0.031	0.005	0.005
世代_1970	0.055	0.101	0.039	0.029	-0.002	0.005
世代_1980	0.191	0.101	0.006	0.029	-0.003	0.005
世代_1990	0.267*	0.105	-0.031	0.033	0.003	0.006
世代_1995	0.209	0.110	0.021	0.037	-0.002	0.006
-2对数似然值	30167.2		34833.7		14597.4	

注：*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01$ 。以下表4、5、6与此相同。

年龄效应：农民工在经济获得方面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年龄和生命周期特征。在经济收入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的收入随之增长，收入的高点出现在40岁左右。在对未来失业可能性的预估上，随着年龄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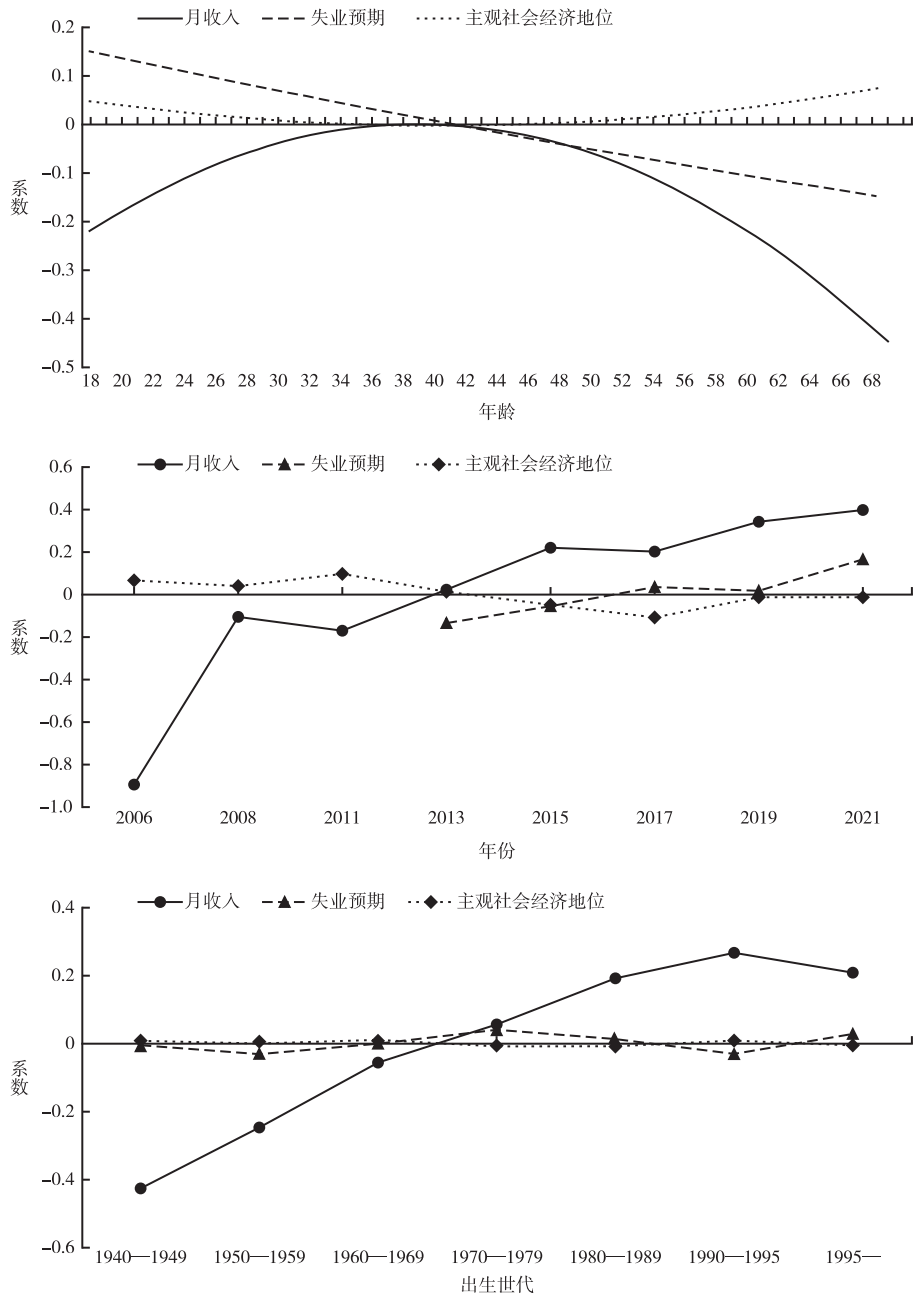


图 1 经济获得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结果

他们的失业预期变低。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即处于 40 岁左右的中年农民工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最低，这与前人的研究是一致的。中年农民工承受更为沉重的生活压力，他们的生活期望

和现实存在差距，导致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最低。^①

时期效应：农民工在经济获得方面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时期效应。具体表现为：农民工的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加，其未来失业预期也呈现提升趋势，他们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呈现“先升高而后下降”的趋势。随着市场对农民工需求的增加，市场结构性短缺而出现的“民工荒”，以及国家提升农民工权益政策的不断出台，农民工的收入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②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最多的部门，而服务业被认为是就业稳定性最差的部门。^③此外，不断涌现的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岗位如快递、骑手等属于高度不稳定行业，^④再加上近几年因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导致整体就业形势不稳定，人们的失业预期提升。^⑤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不仅受到社会横向利益比较的影响，还受到纵向利益比较的影响。^⑥2006—2011年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如农业税的减免，农村养老、医疗保险的实施等极大地提升了农民及农民工的获得感。但这种相对获得感的效应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弱，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依然面临高房价、子女教育等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工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⑦

世代效应：农民工在经济获得方面的世代效应，除在个人收入水平方面存在世代差异外，其他方面都没有呈现显著的世代差异。在收入水平方面，可以看到越往后出生的世代，其个人收入水平越高，这与前人的研究是一致的。^⑧新世代农民工更希望从事高收入的职业，而不断涌现的高收入

① 参见田丰：《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1~143页。

② 参见田丰：《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1~143页。

③ 参见李晓梅：《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稳定就业影响因素研究》，《农村经济》2014年第12期，第100~104页。

④ 参见崔岩：《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93~99页；朱迪：《新业态群体的成长与共同富裕》，《学海》2022年第1期，第60~72页。

⑤ 参见邵敏、武鹏：《出口贸易、人力资本与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兼议我国产业和贸易的升级》，《管理世界》2019年第3期，第99~113页；魏后凯、芦千文：《新冠肺炎疫情对“三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经济纵横》2020年第5期，第36~45页。

⑥ 参见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1~17页。

⑦ 参见王春光、赵玉峰、王玉琪：《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分层的新动向》，《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63~88页。

⑧ 参见田丰：《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1~143页。

新兴职业也为新世代农民工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除此之外，剥离年龄、时期效应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世代的农民工在经济融入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除了收入水平之外，在职业稳定性和个人主观获得方面新、老世代农民工呈现相似的状态。

(二) 社会保障方面

社会保障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如表 4 和图 2 所示。

表 4 社会保障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截距	-1.860*	0.522	1.836**	0.193	-6.370***	0.329	-5.151***	0.393	-6.773***	0.449
年龄	0.0118**	0.0040	0.0147***	0.0028	0.0050	0.0055	0.0067	0.0048	-0.0011	0.0058
年龄的平方	0.0005**	0.0002	-0.0001	0.0002	-0.0004	0.0003	0.0004	0.0002	0.0003	0.0003
性别	0.060	0.042	-0.008	0.054	-0.035	0.069	0.339***	0.059	-0.338***	0.075
婚姻状况	0.094	0.065	0.524***	0.073	-0.073	0.100	-0.153	0.084	0.165	0.110
流动状况	-0.065*	0.032	-0.569***	0.036	0.343***	0.046	0.329***	0.039	0.260***	0.051
受教育年限	0.123***	0.007	0.043***	0.008	0.336***	0.013	0.230***	0.010	0.320***	0.014
时期_2008	-2.028***	0.434	0.279	0.160	-0.816***	0.222	-0.620***	0.176	-1.218***	0.323
时期_2011	-0.202	0.434	-0.097	0.167	-0.167	0.223	-0.068	0.179	-0.292	0.314
时期_2013	0.553	0.432	0.269	0.162	0.114	0.206	0.070	0.167	0.293	0.295
时期_2015	0.791	0.432	0.353*	0.163	0.240	0.206	0.146	0.167	0.304	0.295
时期_2017	0.300	0.432	-0.542**	0.159	0.090	0.207	-0.050	0.168	0.167	0.296
时期_2019	0.587	0.432	-0.261	0.159	0.540**	0.206	0.522**	0.167	0.745*	0.295
世代_1940	0.311	0.317	0.016	0.052	-0.285	0.327	-1.469**	0.481	-0.875	0.515

续表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世代_1950	0.695*	0.290	0.014	0.049	-0.379	0.236	-0.626	0.355	-0.603	0.345
世代_1960	0.521	0.282	0.012	0.045	0.034	0.198	0.076	0.334	-0.048	0.294
世代_1970	0.355	0.281	-0.015	0.044	0.437*	0.189	0.640	0.330	0.616*	0.282
世代_1980	-0.009	0.283	-0.019	0.044	0.437*	0.186	0.795*	0.330	0.736**	0.279
世代_1990	-0.513	0.292	0.038	0.049	0.240	0.205	0.611	0.341	0.451	0.294
世代_1995	-1.360***	0.312	-0.046	0.051	-0.484*	0.242	-0.028	0.361	-0.278	0.329
-2对数似然值	58585.4		63901.1		80237.4		70962.5		84049.3	

年龄效应：农民工在社会保障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方面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年龄和生命周期特征。具体表现为：在养老保险方面，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参与率随之提高，最高点出现在老年阶段；在医疗保险方面，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参与率也随之提高；而他们在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与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年龄效应。

时期效应：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参与方面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时期效应。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参与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2017年、2019年的问卷在措辞上发生了改变，将之前问卷中的“养老保险”变为“养老保险或退休金”，“医疗保险”变为“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尽管概念的范畴变大了，选择的人数却变少了，当前数据无法对这一变化做出解释。本文仅聚焦于2008—2015年的社会保障参与情况，其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尤其表现出与2008年的显著差异，这与国家推行的普惠式养老、医疗政策有较大关系。

世代效应：除医疗保险外，农民工在社会保障的参与方面呈现出显著的世代差异。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参与率随代际

的推移而提高，越往后出生的农民工其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参与率越高。其中“80后”世代的农民工是最具社会保险意识的群体，而“90后”世代的农民工的参与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未在统计学上达到显著水平。“95后”世代的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参与率最低。农民工的参保受制度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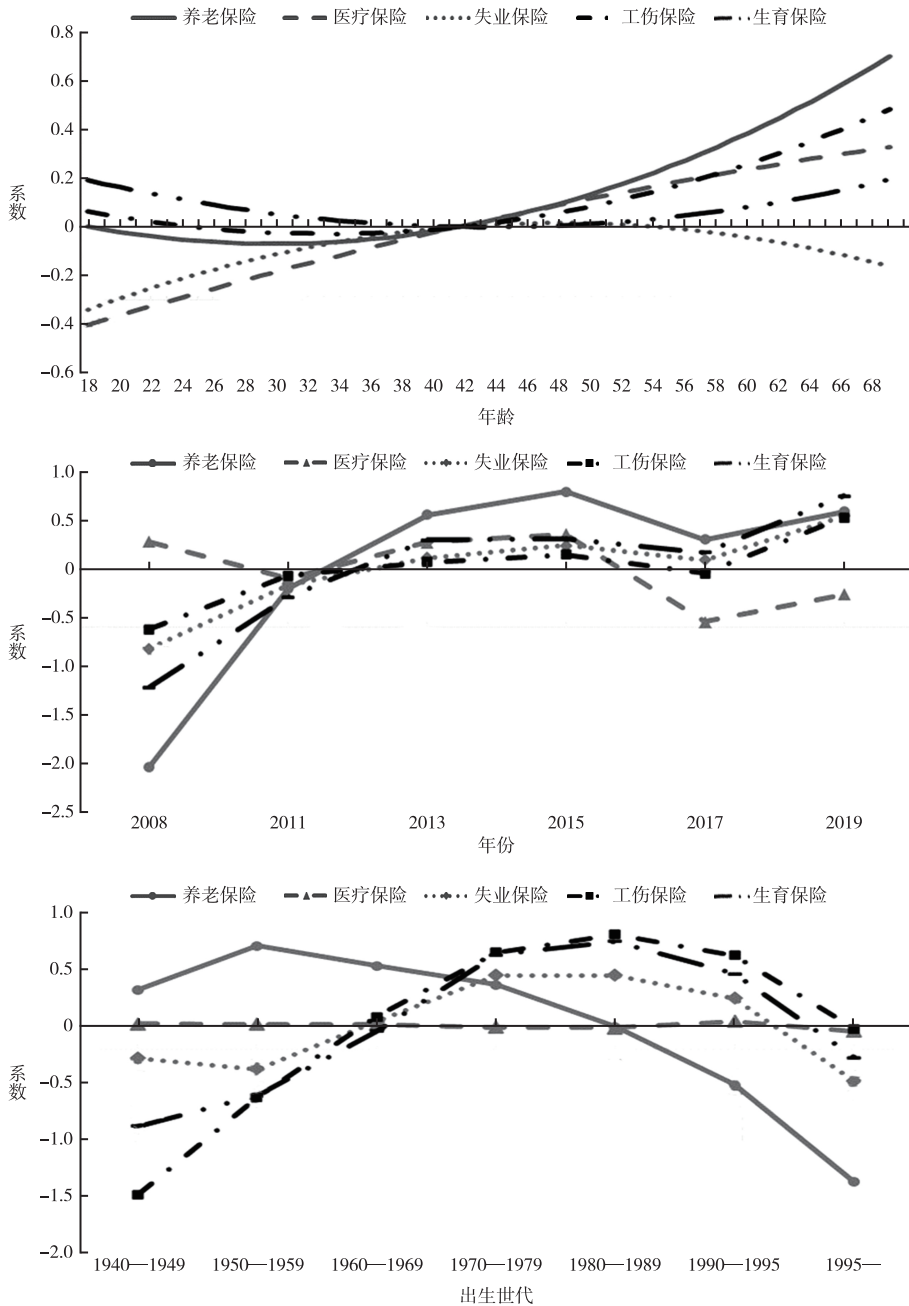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保障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结果

用工企业以及个体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① 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率降低，一方面与他们远离乡土、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农合”的意识和行动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灵活就业形式和较高的职业流动性有关。^②

(三) 社会参与方面

社会参与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如表5和图3所示。

表5 社会参与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

	宗亲/同乡会		校友会		兴趣组织		职业团体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截距	-2.852 **	0.241	-3.341 **	0.278	-3.394 **	0.398	-3.152 **	0.386
年龄	-0.0172 ***	0.0044	-0.0172 **	0.0047	-0.0159 ***	0.0041	-0.0177 **	0.0048
年龄的平方	-0.0004	0.0003	0.0002	0.0002	0.0005	0.0002	-0.0006	0.0003
性别	0.711 ***	0.089	0.296 ***	0.061	-0.125	0.078	0.288 **	0.075
婚姻状况	0.099	0.120	0.076	0.088	-0.315 **	0.103	-0.155	0.102
流动状况	0.079	0.060	-0.167 **	0.046	-0.050	0.058	-0.096	0.056
受教育年限	-0.006	0.013	0.179 ***	0.011	0.139 ***	0.013	0.117 ***	0.012
时期_ 2011	-0.288 *	0.146	-0.481 *	0.195	-0.389	0.358	-0.625	0.341
时期_ 2017	0.162	0.133	0.334	0.185	-0.752 *	0.352	-0.476	0.332
时期_ 2019	0.169	0.135	0.002	0.186	0.541	0.348	0.557	0.329
时期_ 2021	-0.043	0.134	0.145	0.185	0.601	0.347	0.544	0.329
世代_ 1940	0.000	0.049	-0.277	0.278	-0.016	0.086	0.044	0.174
世代_ 1950	-0.015	0.048	-0.465 *	0.203	0.009	0.082	-0.089 *	0.152
世代_ 1960	-0.014	0.046	-0.002	0.159	0.074	0.074	-0.218 *	0.121
世代_ 1970	0.001	0.045	0.239	0.151	-0.084	0.070	-0.056	0.110
世代_ 1980	0.034	0.044	0.326 *	0.147	0.013	0.066	0.109	0.102
世代_ 1990	-0.006	0.046	0.019	0.160	0.002	0.070	0.046	0.113
世代_ 1995	0.001	0.047	0.161	0.181	0.002	0.077	0.164 *	0.130
-2 对数似然值	37328.8		32721.4		37534.8		36492.0	

① 参见田北海、徐燕：《制度安排与行动逻辑：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现状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籍农民工的调查为例》，《学习与实践》2011年第6期，第89~97页；杨桂宏、康晓曦、杨琪：《一线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15~23页。

② 参见许秀川、张卫国、刘新元：《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决策：一个 OLG 模型的考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88~98页；崔岩：《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93~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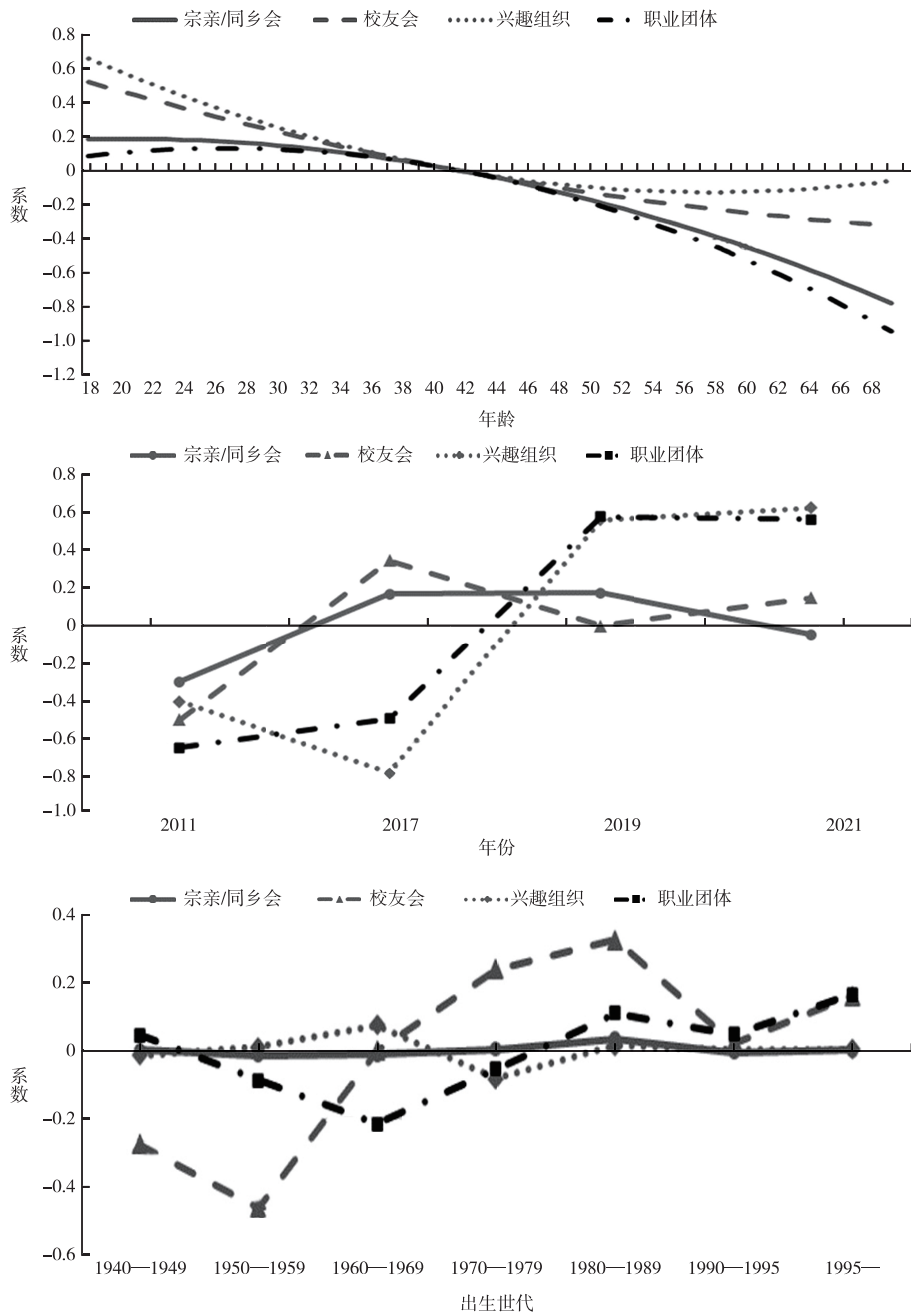


图3 社会参与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结果

年龄效应：农民工在社会参与方面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年龄和生命周期特征。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在宗亲/同乡会、校友会、兴趣组织和职业团体的参与水平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年轻的农民工有更多的时间、动力和需求参

与各项社会组织和活动。

时期效应：在时期效应上比较明显的趋势是2011年农民工的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水平都是最低的，而2017年之后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但在2017—2021年的差异总体上没有在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可见，伴随农民工进城务工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城市中依靠亲缘、地缘建立的“强关系”网络得以加强，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成分的“弱关系”也有一定的拓展，^①但居住、职业隔离等因素使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拓展受到一定的局限。^②

世代效应：剥离年龄、时期效应之后，不同世代的农民工在宗亲/同乡会和兴趣组织参与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校友组织方面，“80后”农民工的参与度是最高的，而“90后”“95后”农民工的参与度并没有明显的提升。在职业团体方面，“95后”农民工的参与度最高。已往的研究也表明，由于职业、居住隔离等，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受限，存在明显的社会网络“内卷化”倾向。^③善于使用网络的新生代、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更多的信息，但是他们的人际社交依然以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网络为主，难以拓展和维系次级社会网络。^④

（四）心理心态方面

心理心态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如表6和图4所示。

表6 心理心态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

	本地人认同	
	系数	标准差
截距	1.405**	0.179
年龄	0.0374***	0.0054

① 参见潘泽泉、杨金月：《社会关系网络构成性差异与“强弱关系”不平衡性效应分析——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的分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09~116页。

② 参见陆文荣、段瑶：《居住的政治：农民工居住隔离的形成机制与社会后果》，《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44~58页；戚迪明、张广胜：《空间隔离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81~90页。

③ 参见陈鹏、高旸：《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与社区治理探研——以J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长白学刊》2021年第6期，第122~130页。

④ 参见 Ningping J., Network of Wechat Contacts and Urban Social Distance: A Case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Vol. 17 (3), 2021, pp. 31-46.

续表

	本地人认同	
	系数	标准差
年龄的平方	-0.0002	0.0003
性别	-0.090	0.064
婚姻状况	0.293 **	0.090
受教育年限	0.014	0.010
时期_ 2011	-0.017	0.053
时期_ 2015	-0.050	0.049
时期_ 2017	0.041	0.049
时期_ 2021	0.026	0.050
世代_ 1940	0.065	0.191
世代_ 1950	-0.058	0.157
世代_ 1960	-0.090	0.123
世代_ 1970	-0.121	0.117
世代_ 1980	-0.103	0.112
世代_ 1990	-0.038	0.127
世代_ 1995	0.344 *	0.149
-2 对数似然值	34995.6	

年龄效应：农民工在本地人认同方面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年龄和生命周期特征。具体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水平不断提高，这与农民工在当地积累的工作年限、社会关系等因素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的工作更加稳定，他们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一个本地人。

时期效应：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水平随时间的推移在升高，但并没有在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表现为：2011—2015 年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水平变化不大，随后从 2015 年到 2021 年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水平有较大的提升，但并未在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是多元的，其中户籍制度因素^①以

① 参见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63 ~ 76 页；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19 ~ 13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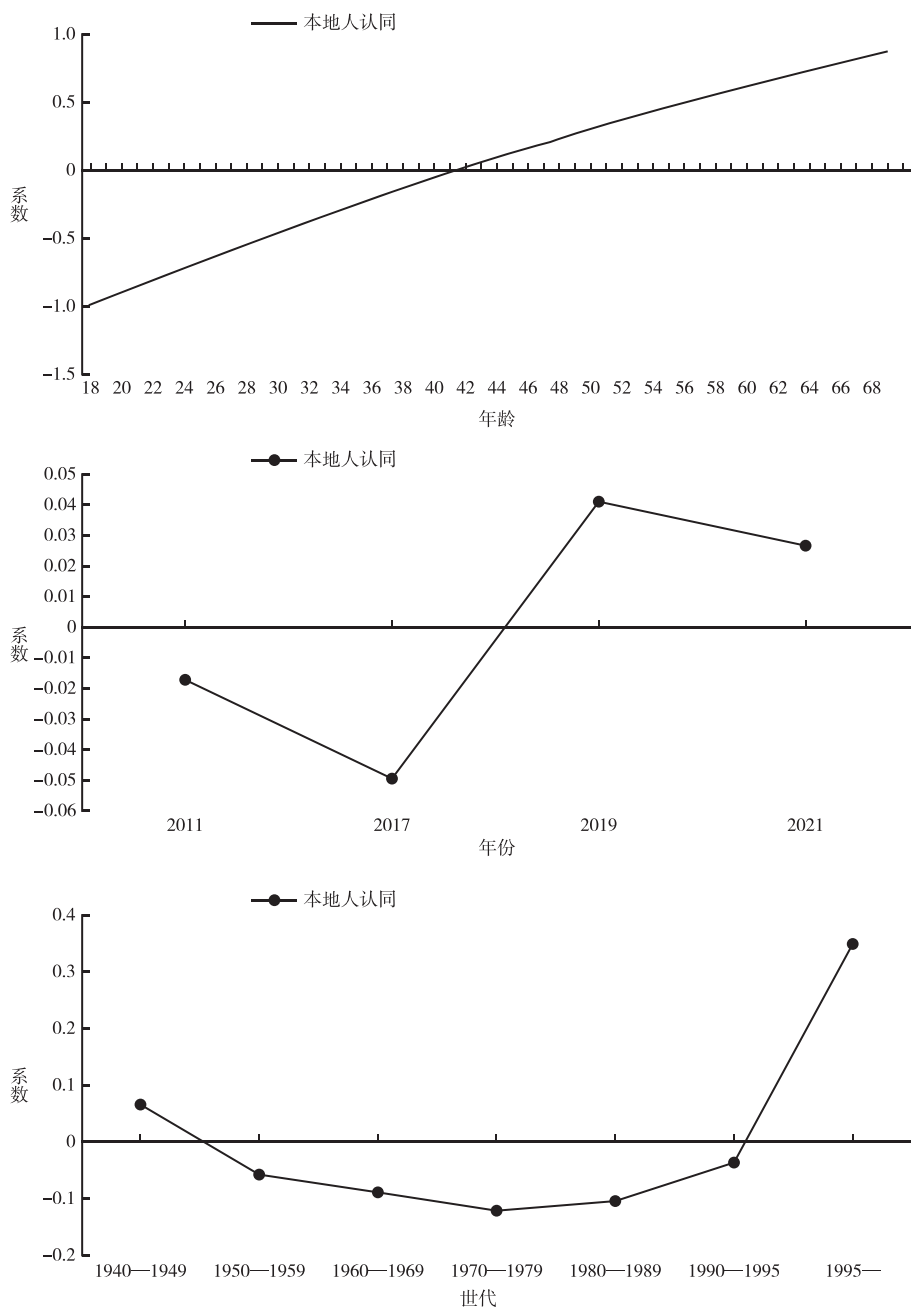


图4 本地人认同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结果

及非制度性因素如乡土记忆、城镇购房状况、与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状况、收入满意度、城市体验等都会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随着城市落户政策逐渐放开，制度性因素产生的影响在削弱，但是农民工在城镇中的购房状况、子女上学、社会交往等因素依然影响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水平的提升。^①

世代效应：世代效应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新世代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世代，而其他世代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前人关于新生代、老世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水平哪个更高存在争议，^②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在本地人认同水平方面，新生代和老世代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本地人认同水平方面，有显著提升的是新世代农民工，这与1995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在乡土认同、成长求学环境、流动动机等方面与之前世代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有关。^③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6—2021年）共计8期、15年的数据，分析了这一段时期新、老世代农民工在经济获得、社会保障、社会参与、心理心态等方面的市民化进程。通过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方法，本文分解了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主要发现和结论如下。

在经济获得方面较为显著的特点是：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都显示农民工的绝对收入得到较大幅度提升，但其就业稳定性预期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并未呈现同等程度的提高。这与以往的研究是一致的，^④ 相关研究分别从国家产业结构转型、服务业以及灵活就业形态的角度解释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偏

① 参见郭星华、李飞：《漂泊与寻根：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人口研究》2009年第6期，第74~84页；赵迎军：《从身份漂移到市民定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93~102页；赵卫华、郝秋晨：《住房消费、城市级别与农民工的市民身份认同》，《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4期，第54~75页。

② 参见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2012年第5期，第1~24页；卢小君、孟娜：《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基于大连市的调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36~40页；杨菊华、张娇娇、吴敏：《此心安处是吾乡——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区域差异研究》，《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4期，第21~33页。

③ 参见杨菊华、吴敏、张娇娇：《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代际差异研究》，《青年研究》2016年第4期，第9~18页。

④ 参见田丰：《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1~143页。

低的原因。^① 石智雷等进一步指出“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这一问题，其实质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② 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过低还可能会降低身份认同、助长社会失范等，应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重视。

在社会保障获得方面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获得随时间的推移提升明显，但在世代效应方面，并未呈现线性上升趋势，“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最高。农民工的参保水平受多重因素影响，尤其是受国家制度安排、用工企业以及部分个体性因素的影响。^③ 时期效应表明国家在推进一系列普惠式农村养老保险、“新农合”等方面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学者指出的农民参保出现“泡沫化”现象。很多农民每年缴100元的象征性参保、部分农民只缴一次的“一次性参保”、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缺乏与城镇职工同等权益的社会保障等问题依然是阻碍他们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原因。^④

在社会参与方面较为显著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的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水平有所提高，但在2019年后变化不大，而新、老世代农民工之间差异不明显，仅在校友会参与方面“80后”农民工的参与水平相对较高。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在增强，但职业隔离、空间隔离等原因阻碍了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拓展，^⑤ 而生活场域和职业场所的高度流动也不利于农民工建立长期的社交网络关系。^⑥ 农民工在人际社交上依然

① 参见李晓梅：《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稳定就业影响因素研究》，《农村经济》2014年第12期，第100~104页；崔岩：《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93~99页；朱迪：《新业态群体的成长与共同富裕》，《学海》2022年第1期，第60~72页。

② 参见石智雷、刘思辰、赵颖：《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社会》2022年第1期，第88~123页。

③ 参见田北海、徐燕：《制度安排与行动逻辑：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现状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籍农民工的调查为例》，《学习与实践》2011年第6期，第89~97页。

④ 参见郑雄飞：《身份识别、契约优化与利益共享——我国养老保险的制度变迁与路径探索》，《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98~122页；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青年探索》2010年第3期，第5~15页。

⑤ 参见陆文荣、段瑶：《居住的政治：农民工居住隔离的形成机制与社会后果》，《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44~58页；戚迪明、张广胜：《空间隔离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81~90页。

⑥ 参见潘泽泉、杨金月：《社会关系网络构成性差异与“强弱关系”不平衡性效应分析——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的分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09~116页。

以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网络为主，难以拓展和维系次级社会网络，^①这说明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心理心态方面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水平随时间推移有所提高，但并未达到显著水平，世代效应突出的特点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世代。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是复杂多元的，随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政策的放松，早期被广泛关注的户籍制度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变小，但与制度相关的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依然存在。^②除此之外，非制度性因素如乡土记忆、城镇购房状况、收入满意度、城市体验等因素也对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产生影响，^③从这个角度讲，大部分成长经历都在农村之外的“95后”农民工可以拥有更高的城镇身份认同水平，相较于“80后”新生代农民工徘徊在乡土认同和流入地认同之间，新生代农民工更少出现“认同模糊化”“认同困惑”等问题。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外，也需要注意在剥离年龄、时期效应后的世代效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稳定、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参与水平方面并没有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更大程度的提升，这是后续市民化进程需要关注的问题。“高收入、高本地人认同”与“低稳定预期、低保障水平”形成新生代农民工冲突性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与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行业类别、职业类型具有密切关系。针对新职业青年的调查显示，有26.3%的新职业青年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④由于一些新业态职业（如骑手）与平台企业之间签订的并非长期劳动合同关系，平台企业采用劳务外包、众包等形式规避责任、降低成本，这实质上在法律和社会保障上将新职业的从业者置于非常不利的位置。^⑤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步入婚姻家庭及生育的生命周期，他们对就业稳定和社会保障权益的需求会进一步凸显。政府应该从法律、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层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① 参见 Ningping J. , Network of Wechat Contacts and Urban Social Distance: A Case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Vol. 17 (3), 2021, pp. 31 - 46.

② 参见赵迎军：《从身份漂移到市民定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93~102页。

③ 参见赵卫华、郝秋晨：《住房消费、城市级别与农民工的市民身份认同》，《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4期，第54~75页。

④ 参见朱迪、崔岩、高文珺等：《2020年中国新业态与新就业青年调查报告》，李培林、陈光金、王春光主编：《社会蓝皮书：202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04~232页。

⑤ 参见崔岩：《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93~99页。

而企业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为他们长远、稳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劳动权益保障、职业培训和规划。

此外，本研究中的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都显示社会融入的四个层面（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融入）存在不同步的状况，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遵循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层层递进的顺序，社会融入的层次呈现平行、多维的状态。^① 在本研究中大部分样本是本省市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其本地人认同水平相对较高，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是可以看到农民工在各类社会组织和网络的参与并没有随时期推移呈现显著增长的趋势。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具备更强的经济实力和更高的本地人认同水平，然而其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参与水平却并没有显著提升。之所以呈现这样的情况，可能与农民工社会融入过程受个体需求、市场需求、政府能力、政策赋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有关。农民工收入的增长更多来自内在的驱动力，这是农民工主体性发挥最大的维度，而本地人认同水平与城镇化过程、国家对流动人口的利好政策密切相关，社会保障和社会参与则需要农民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外部赋能同时参与形成合力。目前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政策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张力，在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此外，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较单一且社会参与水平不高，基层政府在社区构建中要注重构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互动机制和交往平台，调动农民工的积极性，提高其社区参与水平。政府和企业应搭建职业团体、老乡团体、行业学习组织、兴趣团体等可拓展的社会支持资源和互助平台，以帮助农民工在城市中“织网扎根”。

（责任编辑：温莹莹）

① 参见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2012年第5期，第1~24页。